

陈绍闻自传

陈绍闻字叔异，汉族人，1912年生于湖南湘潭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42年7月毕业于中央大学研究院法科研究所，获硕士学位。解放前先后任交通大学贵州分校讲师、副教授，国立编译馆编审，西北大学和安徽大学教授。解放后任金陵大学副教授、兼任南京大学副教授。院系调整调复旦大学任副教授、教授。

我父亲陈南楨是秀才，受新思想影响，赞成“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主张，并加入了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为支援武昌起义军筹饷作出过贡献。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了，父亲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之志不渝，加入了中华革命党。父亲对于“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主张，可谓身体力行。辛亥革命后，他曾出任湖南实业司矿业科长，对于开发矿产尽过力，华昌实业公司就是他协助创建的。遗憾的是，在国外进行矿产贸易的赚了钱汇不回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矿产滞销，华昌实业公司倒闭。父亲毕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湘潭办教育，由于教育经费限制，他眼看亲自参与创建的一些学校，如乙种商业学校、育幼学堂、县中（后来恢复）等停办，而已束手无策，不胜痛心。他过花甲之年不久，便赍志以没。父亲是第一个对我有深远影响的人，我上大学选择读经济系，确有投身实业界作企业家的设想。这一目标难以实现，于是毅然走上讲台，教书以终其身了。

第二个对我有影响的人是我的堂舅父杨昭植烈士。他是湘潭较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之一。他大概是在长沙上师范学堂时

入党的，毕业后回到湘潭创办了一个小学作为党的基地开展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大革命期间任湘潭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县委副书记、书记，“马日事变”后不幸被捕，惨遭杀害，年仅二十六岁。是他，曾引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常到我家来，有时也借我家开党的负责人的碰头会，我因而认识不少县委部长和委员。1925年至1926年我在长沙上初中，在他的鼓励下，我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这一年正是准备北伐和进军江西和湖南的时期，长沙革命风云紧急，省长赵恒惕加强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1926年上半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悼黄爱、庞人铨、黄静源、汪先云四烈士，为庆祝劳动节的群众集会，遭到军警镇压，伤了许多人。1926年秋我转到湘潭县中上学，杨昭植让我担任了湘潭儿童团团长，雷厉风行地搞三禁（禁抽大烟、禁娼、禁赌），确有点“左”，搞了一阵子就搞不下去了。“马日事变”后，我躲藏在乡下伯父家，跟他读《诗经》、《论语》、《孟子》和《左传》等，我的古汉语略有基础，就是这时打下的。

我后来离开湖南，到杭州继续上学。我的大哥陈伯君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当时任浙江大学秘书长，这是我能到杭州就读的依靠。他的朋友和我的老师中，北大毕业的很多。蔡元培的为人，经常耳闻，在我的思想中不知不觉地植了根，对我的为人、治学有很深的影响。听说蔡元培先生说过，为人要有所不为而无所不容，我是作为座右铭而时刻不忘的。我攻读经济学，各派各家都浏览，不囿于某一学派，且常阅读中外历史和文学名著，也喜看专业的和非专业的报刊，以扩大知识面。我从中得益很多，不仅增长了知识，而且扩大了我的工作适应性。因而，我参加工作后，多次改变所担任的课程，能够较顺利地担负起来。

“马日事变”以后，我跟党的联系中断了。虽然我常常想起大革命时期那段火热的生活，但我不知道怎样找到党，对自己那段经历讳莫如深，不敢对人讲。所以，我埋头读书，不问他事。

“九·一八”事变震动了我，又投入了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当时我已考上了同济大学附属中学德文补习班，在上海上学。我积极参加群众集会、游行、宣传等活动，还随上海赴京请愿团去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目睹了文生氏英文学校学生杨洞恒惨遭杀害和蔡元培先生反对镇压请愿学生，同学生队伍步出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情景。抗日救国学生运动遭到镇压，但其势不衰，至“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爆发而达到高潮。其后，国民党当局对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学生进行迫害，开除、留校察看、记过、责令家长严加管束。我属于最轻的一档，结局是仍回杭州就读，温习功课重新报考。几经周折，我花了十年才读完本来只需六年完成的中学学业，这种牺牲，应该说是微不足道的。

上大学和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期间，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越来越不得人心，增加了我对他的厌恶。二是我受了所谓“温和社会主义”或“中间道路”的思想影响，直到解放后进行思想改造才认清了它的本质，口头的社会主义，实质是资本主义。通过思想改造，潜藏在我思想深处的少年时对党的感情复苏了，下定决心要努力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干一辈子，一九五六年我光荣地加入了党，更增加了我的责任感。一九六〇年以来，我改行从事中国经济史教学，深感无论是中国经济史或中国经济思想史都还处于落后状态，人少任务重，很难改变这种局面。我个人在当时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改变这种局面的愿望是一直存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争取建立了中国经济史学教研室，制定了培养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规划，制定了教材建设计划，在教研室全体同志共同努力下都逐步得到实现。我们的成绩甚微，距离发展和提高中国经济史学的要求还很远，当继续为此而努力。

解放前后较长一段时期，我从事部门经济学的教学。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由于工作需要，我开始接触中国经济史，先

是参加修订《辞海》中国经济史部分辞目释文，后又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专题讲座》课。因而我对中国经济史逐渐发生兴趣，并了解到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都还处于初创阶段，愿意为建立和发展这两门学科稍尽绵薄之力。不幸的是，在那革文化之命的动乱岁月里，我的工作中断了十年，书籍稿件散失殆尽。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鼓舞着我振作精神，重新开展工作。首先，我争取将我担任主任的经济史教研室改组分为中国经济史学教研室和外国经济史学教研室。其次是抓教材建设。我本着从无到有、从粗到精的精神，团结组内同志并提倡开展校外协作，以解决人力不足的困难，编写了一套教材，均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有了这套教材，现在我室已可开设《中国古代经济文献选读》、《中国近代经济文献选读》、《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课。再次是培养青年教师。青年教师主要是留校的研究生。自1978年以来，我们招收了十多名硕士研究生，留用的只是少数，输送给兄弟单位的居多。他们都能独立开课和进行研究工作，已在报刊发表论文五十多篇。经过教研室全体同志的努力，我们已经承担了举办教师进修班、助教进修班的任务，并接受外国进修生和和研修生，来进修的教师达五十多人，外国留学生近二十人。我作为教研组的一员，对上列各项工作也尽了一定的力。

我的研究项目主要是编写教材，《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已进行修订，不久将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文选》和《中国近代经济简史》也将进行修订。《辞海》经济分册修订后已付印，还将参加合订本的修订工作。我目前还承担了《中国经济史学要籍介绍》的编写和《经济大辞典·中国经济史学卷》的主编。这几项任务都要在“七五”期间完成。同时，我还写过若干篇论文，如1962年发表于《文汇报》的《开展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它

是较早发表的呼吁重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文章；《也谈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问题》（见《学术月刊》1963年第一期），主张近代史的下限定在1949年，还认为五四运动不能作经济史分期的标志，而1927年中央苏区的建立应作为划分一个新时期的起点；《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见《学术月刊》1964年第10期），针对个别人大量引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提出要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从经典著作中去寻章摘句；《中国经济史学之回顾与展望》（见《复旦经济论丛》第1集1985年5月），探讨中国经济史学所以落后的原因，并展望其发展前景；《开展中外经济史学的比较研究》（见《复旦经济论丛》第2集1986年5月），提出要破除欧洲标准模式（欧洲中心）论，要破除民族自卑感和西方经济思想中国古已有之两种倾向。以上所举的文章，都是服从于建立和发展中国经济史学这一目标的。我另外还单独或与同事合写过若干篇文章，也都与中国经济史学有关，不一一介绍。

我已年逾古稀，精力日衰，但愿有生之年还能把自己探索中国经济史学的点滴体会写下来，供后来者参考。

